



内 部 发 行  
战 后 感 情  
——佳木斯文史资料第九辑

---

出版单位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 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承印单位：黑龙江省农垦报社印刷厂印刷

出版日期：1988年10月 印数：1500

开本：32 字数：140000 印张：6 插页：4

---

黑新出图（89）025号 工本费：1.80元

YT33/20

## 目 录

黑土樱花.....	于济川(1)
养育情深.....	于长波 (20)
看望自己墓冢的人.....	吕诚 化雨 (37)
九死一生，大彻大悟.....	吕诚 化雨 (55)
成才深感育才恩	
——访主治医师张淑琴.....	孙景华 (65)
山形——富锦.....	唐永华 (83)
两重父母两国情	
——记建筑工程师司安良.....	董大为 (84)
访东宝山村党支部书记范福贵.....	王志声(105)
孤儿成富户.....	穆 华(119)
一名专业美术工作者的由来.....	谷鸿宾(129)
少年坎坷老来福.....	谷鸿宾(136)
我是个幸福的孤儿.....	刘珂自述 高峻峰整理 (143)

- 助理工程师王洪德的特殊经历………张新榜 边吉（149）
- 我在中国土地上成长………边福光口述 卓哲整理（157）
- 遗弃与恩养………菅原季子口述 苏来整理（166）
- 中国，她倾心的第二故乡………庞英、边吉（173）
- 埋骨何须桑梓土………藤田爱子口述 高峻峰整理（183）
- 我在中国扎了根………焦喜来口述 谷鸿宾整理（190）

## 前　　言

值此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约十周年之际，我们谨以这辑文史资料献给所有致力于两国和平友好的人们。

掀开我国近代史页，中日两国关系有一个从战争演变为和平的喜人变化。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横行无忌、肆意侵略的时候，我国人民奋起抗战；而在日本战败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我国政府则与日本政府化干戈为玉帛，友好相处。这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而又热爱和平的伟大气魄。而且，就在日本战败的条件下，在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中国土地上，还出现了许许多多中国人民收养日本孤儿的感人事迹，这又进一步展示了中华民族同情弱者、济困扶危的美德。

三江平原曾是日本开拓团较为集中的地方，战后被遗弃在这里的日本孤儿比比皆是。我们从三百多例收养日本孤儿的实例中，征集了这辑史料。收养这些日本孤儿的都是中国普通老百姓，他们家家经受过严酷的日伪统治，有些人则亲身遭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摧残，但他们不念旧恶，能把日本侵略者和无辜的日本妇女、儿童加以区别，表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政治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；他们的行动始于日本战败之时，先于中日两国政府建交之前，成为中国政府决定与日本政府化干戈为玉帛的一种群众基础。这对中日关系的良性演变具有深远影响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是推动这一历史发展的动力。

由中国老百姓收养的日本孤儿，也没有辜负中国亲人的苦心。他们感恩图报，有些人已经成为工程师、主治医师等专业人才，有的当上了党政干部，正在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力量。他们早已把中国人民视为亲人，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。其中有些人即使回到日本国定居，仍与中国亲人保持着密切的亲缘关系，这在日本国内也增强了对中国友好的力量。一切具有良知卓见的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，必将由此受到启迪。我们觉得这辑史料不但可以反映中日关系变化的历史内涵，而且有助于推动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健康发展。

在这辑史料征集过程中，我市各县（市）政协文史工作者积极协作，连篇赐稿，我们深表谢忱。

编者

1988年10月

# 黑 土 櫻 花

于济川

定居在黑龙江农场总局所属绥棱农场场部所在地——绥棱县宝山乡十三井村的猪鼻百合女士，于1987年9月回日本同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家族团聚，1988年2月又返回中国定居。这一消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：她做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，被遗弃在中国农村生活了40多年，血泪交织，骨肉分离，作梦也会盼望能够回到她的祖国和失散的家族团聚，现在既然骨肉重逢，又为什么重返中国、遗梦两地呢？少数中国人在国外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下竟然乐不思蜀，难道猪鼻百合不喜欢享乐，甘愿在中国过清贫生活？我怀着满肚子问号，访问了这位54岁的日本妇女。

我们的谈话是愉快的，她以日语为主，夹杂着流畅的东北方言，我以中国话为主，夹杂着生硬的日语，越谈越投契，达到了采访的最佳境界。猪鼻大嫂说她今天遇見了知音，满肚子酸、甜、苦、辣全倒出来，有苦涩的回忆，也有梦幻似地憧憬，更多的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带来的说不完的愉快。百合大嫂的故事，是对侵略战争的血泪控诉，是中日劳动人民相亲相爱的历史见证。

## 黑水白山血泪痕

那还是1945年初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时候的事情。当时，意大利早在两年前就因国内发生政变而宣布投降，欧战正在柏林郊外进行，德国法西斯也已苟延残喘，朝不保夕。在这种对侵略者十分不利的世界形势下，日本法西斯仍然作着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黄粱美梦，迫使最后一批移民进入中国东北。无辜的日本劳动人民，在刺刀与政治威迫的双重压力下，携老扶幼，抛弃温暖的家庭，离开樱花盛开的家乡，踏上异国的土地。猪鼻百合的父亲猪鼻常吉率领一家五口被编入开拓团，来到黑龙江省孙吴县，那时候猪鼻百合仅11岁。

开拓团的生活还没有稳定下来，日本人撒在中国领土上的作物种子刚刚扬花结实，苏联红军就从西伯利亚挥戈南下。被中国抗日军民拖得精疲力竭的日本关东军，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丢盔卸甲，狼狈逃窜；接着，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开拓团的日本劳动人民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战败国遗弃在被侵占的中国领土上的无主孤魂。这对日本劳动人民来说，实在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，亡国这且不言，被遗弃的无辜者将会遭受怎样的命运……中国人能对他们怎样呢？法西斯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，是否要无辜的日本人民来偿还？中国人能容下杀亲之仇吗？中国人的道德

容量能消化那一块块的血泪结石吗？中国人的政治气度能把无辜和有罪截然分开吗？这一切，正是开拓团的日本劳动人民解不开、摸不透的疑问，他们被笼罩在恐惧与不安的绝望气氛中。

有人开始无目的地逃难——正确点说是逃命。逃到哪去呢？中国的领土好大啊！

早些时候来中国的，在几年的生活与生产中，多少也交了几个中国朋友，现在成了救命星。有的日本人，一屁股坐在中国朋友的热炕头上请求庇护，喝一碗中国人的大碴子粥，似乎就有了安全感。

猪鼻常吉一家刚来到中国才几个月，无门可投，只有带着全家五口，无目的地钻进小兴安岭脚下的大森林……

走，无目的地走。没有路，也不需要路。路是通往有人烟的中国村庄的，他们现在就是要避开人，避开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过的中国人。带的干粮能吃几天？无法估算，也用不着估算。一切都是盲目的，唯一能自我意识到的愿望就是逃命。

幽灵一样的一行五人。猪鼻常吉拄着一根木棍，背着仅有的一一个食品口袋和一块毛毯；后边是他的妻子高桥信子，背着刚满三岁的小女儿；再后就是14岁的儿子猪鼻长男，右手领着11岁的妹妹猪鼻百合。原始森林的风啸声、鸟叫声和兽吼声都使他们心惊肉跳。从新建的开拓点跑出来已经四天了，猪鼻常吉只吃过两次东西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只有自己少吃一点，才能叫老婆孩子多活一天。天黑他们就找个背风的地方露宿，天亮就晕头转向地走，走……

常吉实在走不动了，肚里象有一团火在燃烧，周身湿淋淋地出着虚汗。严重的饥饿和过度的体力消耗，使他的生命

已趋枯竭。他低头蹲在一棵大树下，一声不吭，任凭老婆喊，孩子推，他只是晃一晃那沉重的身子。信子扑在丈夫的身上，撕心裂肺的叫着，常吉却紧闭双眼。最后那一刻，只见他嘴里淌出一股粘液，身子顺着树身慢慢地倒下，背上的小食品袋压在身下。他死了！生命的结束竟是这样简单！

现在，只剩下母子四人了。

人在逆境中生存，将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如果说，在能看到或能想象到一线希望的危难中挣扎，那一缕或明或暗的希冀之光尽管微弱，也许在脚下一闪，就会引着人前进一步。可现在，信子的希冀之光在哪儿呢？她连迈出第二步的方向都不知道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她只有一个想法：为了孩子，那怕只活到明天。

丈夫的葬礼是一场号淘大哭，除此而外什么也谈不到了。她抱起三岁的小女儿，带着两个泪人儿似的童年孩子，又上路了。

茂密的原始森林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，只能分清白天黑夜。食品已经不多了。信子只觉得背上的孩子十分沉重，压得她迈不开步。一天，他们露宿在一个长满蒿草的洼坑里，天亮醒来，正要吃点东西继续走，可是三岁的小女儿睡个不醒，那红扑扑的小脸蛋红得出奇。信子的嘴刚刚触到孩子的脸上，就觉得象挨着一块刚出锅的肉。孩子在发高烧呢：鼻翼微微扇动，呼吸急促而又细弱。是把孩子抱起来，让她醒过来承受疾病的折磨然后死去呢，还是就让她安安详详地在昏睡中离开这个世界呢？信子知道，孩子活不到天黑了，也不能再睁开眼睛喊声妈妈了，与其眼看她饿死、病死，还不如让孩子就此长眠。百合刚要推醒妹妹，被妈妈制止了。

“妈妈：为什么不叫醒妹妹？”

“不用叫她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是做母亲的心狠吗？在两种必然结局的残酷现实面前，最佳的选择也只能是看不见惨剧的最后一幕。信子拾了些树枝和蒿草，轻轻地盖在孩子身上，她已没有眼泪了。如今，只剩下母子三人，明天还能剩下谁呢？

走出原始森林，看见了蔚蓝的天空，绿油油的草原，远处还有庄稼、村落、炊烟。那是中国人居住的美丽的农村，日本人能走进去吗？那里有粮食，有水，有暖烘烘的炕头，有热气腾腾的饭菜……信子坐在一棵老树下，脑子里考虑着一个新的决断。她想：中国人如果要报仇，肯定是杀日本的成年人，孩子们也许不会被看作报仇的对象。如果不离开孩子们，其结果只能是一起饿死或一起被中国人杀死！要是让两个孩子到中国人住的村落自找生路，也许……这位可怜的母亲竟然想出这样一个实在难以承受的“妙计”。她狠狠地咽下一大口又酸又苦的口水，把长男和百合叫到跟前：“听着：吃的东西已经没有了，前后都有中国村庄，你们两人分开了去那里找个生路吧，我想也许有好心的中国人会收下你们，他们不会杀小孩的！不要和妈妈在一起了，我会连累你们！”

两个孩子一下扑到妈妈的怀里，泪水湿透了母亲的衣服。这是一出什么样的悲剧！悲剧有这样悲、这样惨的吗？该死的战争！该死的日本军部！

听话的长男和百合竟然从母亲的怀里站起来，一东一西地向中国村庄走去，他们把一个母亲的心撕成两半，各自离去了。百合慢慢地回过头，大喊一声：“妈妈再见！”径直走了。信子不敢看也不敢哭，只是把头埋在心口上，大口大口地往肚里咽酸水，她们还能再见吗？

百合沿着蜿蜒的小路，绕过方格稻田，黄昏时怯生生地、

走进一个村庄，这就是现在的绥棱县东北140里的半截河村。孩子很少考虑死的威胁，更多的是饥饿的折磨。碌碌饥肠把她推进村边的一家院内，一位慈祥的老头正在打扫院落。百合突然站在他面前，老人端详了半天，摸摸她的头，一声没吱，把百合领到屋里了。老伴惊诧地看着眉清目秀的小女孩，吃惊地问老头：“谁家的？”老头说：“问啥，还看不出来？咱家有姑娘了，快拿吃的去，孩子饿坏了。”

这老头就是半截河村的农民王惠中，老俩口只有一个儿子已娶妻另住，这回从天上掉下一个姑娘，可真是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。谁会料到，这个偶然中的必然，竟成了猪鼻百合一生中的转折点。从此，猪鼻百合改名王百合，成了小小山村的一朵含苞的樱花。从此，王惠中老俩口连睡梦中都在微笑；在好多天里，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整天接待前来道贺的乡亲。从此，百合的心灵上深深地埋下一颗种子：“中国人真好，我爱中国。”她的现实已经证明，爸爸妈妈先前关于中国人要报仇的猜测完全不对，那只是误会或者是偏见。此后，每当她帮助养父在稻田里拔草时，总是凝神望着那棵山下的大树，怀念着他不该失散的亲人：妈妈，你在哪儿呢？长男哥你在哪儿呢？小妹也许还熟睡在那棵松树下，身上还盖着蒿草和树枝；爸爸……可眼前这养育她成长的两位中国老人给予她的慈爱，很快就熨平了她心底的创伤。一年、两年，十几年过去了，百合似乎已忘掉了过去的一切。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流利的中国话，再加上那两只纤巧勤快的手，已引来众多人的喜爱。爱是暖烘烘的，它可以消化痛苦结成的疙瘩。

百合18岁那年，王惠中迁居离半截河40里的四海店村。那里是诺敏河畔，王惠中在那里盖起了三间草房，种地兼打

鱼，日子过得满好。那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了，农村已成立初级合作社，农民在田间劳动之余，可以自由搞副业。十三井村的猎手曲万金，经常在狩猎后到王惠中家串门。也不知他是被王惠中老头那热情好客的态度所感动，还是被百合那双美丽的眼睛所吸引。曲万金一天不到老王家，就好象从眼底飞掉一只美丽的山雀。爱情确实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基因……1953年百合和曲万金终于结合了。

这个小家庭是美满的，曲万金有中国男子那种对妻子的爱护加保护的传统，百合更具备日本妇女那种对丈夫殷勤顺从的美德，小俩口勤劳持家，日子过得很不错。百合善于料理家务，更善于和邻里乡亲们和睦相处，全村不管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，百合不请自到，忙前忙后，深受全村人宠爱。所以，全村人不管老少，对她有一个统一的爱称——百合嫂。即使在“文革”那种特殊历史时期，全村人对百合嫂没有碰过一指头。

到1988年，百合在十三井村生活了35年，她吃惯了东北农村的大碴子豆饭，也睡惯了东北农村的热炕头。她从中国劳动人民那里熏陶了勤劳节俭的优良品德，又从北大荒黑土地上造就了直率诚恳而又顽强的个性。在曲家，她生了四男一女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，异国已变成了她的第二祖国。

百合不是不想念自己的亲人。在日本，还有她移民时唯一容许留下的高桥大哥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百合依稀还能想起大哥的模样。大嫂是谁？她不知道，想象中也是一位非常贤慧的日本妇女。还有那繁华似锦的青森县，满街樱花的八户市……在中国，还有生死不明的长男哥，他现在流落在何方？更惦记的是老泪纵横的妈妈。百合悔恨自己，为什么那

天从妈妈怀里站起来，只说了声再见就走进半截河村呢！中国爸爸王惠中收留她的时候，为什么自己一声没提到妈妈。如果当时对惠中爸爸说：“我妈妈还在那边大树下呢！”肯定也会接到村里来。当然，那时候她还不会说这句简单的中国话；更重要的是妈妈说过，中国人很可能杀死所有的日本大人来报仇！百合当时也是相信的，那又怎能出卖妈妈呢？还有那躺在树下熟睡的小妹妹，也许蒿草深处至今还留有她完整的躯体……这一切，每到夜深人静躺在热被窝儿的时候，她总是悄悄地想，每次都是泪水浸湿了枕巾。百合幻想着亲人团聚，象中国古老的民间故事描绘的那样，失散几十年的亲人突然重逢，悲喜交加，那情景也许是人世间最大的享受。

### 咫尺天涯未相见

1986年初春，一辆吉普车突然开进十三井这个距县城百里的小山村，村干部陪着两位年轻的县干部走进猪鼻百合的家。他们给百合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消息，句句都象神话一样。妈妈的下落，长男哥的下落，高桥大哥的音信……每一个字都有力地撞击着百合的心，是惊、是喜、是梦、是真……

就在大树下和妈妈“永别”那天，长男哥和她各奔西东。长男比百合大三岁，他想的比较多，没敢直接走进村庄，而是隐藏在一处僻静的草丛里观察动静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从小路那边走来一位扛枪的人，长男吓坏了，他想躲，但已来不及了，那人已经向他举起了枪！

“救命！”长男这一句简单的中国话，没想到真的救了

他的命，猎人收起枪走过来了。

“小家伙！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当是是个小熊瞎子呢，差点送你‘回家’！”

长男听不懂，他跪着，瞪着两只可怜巴巴的大眼睛。

那猎人仔细端详了一阵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和颜悦色地用日语问：“你是日本小孩吧！”长男又惊又喜地点点头。“天黑了这里有狼，跟我回家吧。”长男乖乖地跟着这位好心的猎人走了。

这位猎人就是现在的海伦县护林乡群英村农民王得胜。他是早年居留中国的朝鲜族人，会说日语，当时也住在绥棱县境内。论地理位置，他家离百合只不过三四十里，而长男与百合兄妹各自被人收养，近在咫尺，四十多年竟然互不知情。长男后来改名王文显，养父王得胜供他念完中学，现在是海伦县护林乡一名工商干部。1985年县负责外事工作的干部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找到他，由他那里打听到妹妹百合也失落在附近，然后又过三个月才找到百合的下落。

百合还听到了可怜的妈妈的消息。

那天在山下大树旁母子三人分开后，信子又走进了茂密的森林，吃的东西早没有了，她再也没有气力走动了，坐在草地上大哭一场，找个合适的树枝，解下腰带，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就在这时，来了一个“放山”（挖参采药）的人。信子说不了几句中国话，比划了半天那人才知道她是日本人。那人表示叫信子到他的住处去吃点东西，休息休息，还比划着表示中国人根本不会杀害日本老百姓。信子见这人态度诚恳，没有加害她的意思，就顺从地跟他走了。

说是家，实际上是在山阳坡挖的一个地窨子。每到夏秋两季，“放山”的人就住进这种地窨子，为的是节省行路时

间，冬季才下山回家。信子在那个地窨子里得到“放山”人的照顾，后来就成了信子的第一个中国丈夫，也是他的救命恩人。这人叫王殿库，望奎县人。1947年死于伤寒病。

那时信子已会说比较流利的中国话，为了再找个保护人兼丈夫，信子主动嫁给王殿库的好友，鄂伦春族猎户王海山。王海山人称“王炮”，一手好枪法，春夏两季打猎，秋冬两季挖参采药，每年春节前到哈尔滨一次，卖掉一年的收获，换回生活必需品。他在感情上给予信子的，不亚于王殿库的救命之恩。

1953年初，王海山在哈尔滨旅店里听到一个既新鲜又烦恼，既高兴又颓丧的消息，说是东北人民政府贴出布告，凡是尚留在中国的日本开拓团成员，愿意回国的，可到人民政府登记，由中国政府护送他们回国。王海山一夜未曾合眼，他第一次感觉到将要失掉爱情的痛苦……这消息是否要告诉同他相依为命六年的老伴呢？告诉，自己又将变成山林里的老光棍儿；不告诉，是不是有点心眼不正！谁没有祖国，谁没有亲人？能为了自己有个妻子而让别人失去母爱，失去家庭，亲骨肉不得团聚吗？他翻了几次身，坐起来抽了几次烟。天亮，他打定了主意，上街给信子买了几件新衣服，急匆匆地上火车了。

高桥信子怎么也不能相信王海山给她带回的消息是真实的。这太突然了，太离奇了，太叫人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“信子，你应该回去，你在中国是万般无奈，日本国有你的亲人，如果两个孩子都活着，迟早有见面的一天。”

“你呢？你怎么办呢？”信子流泪了。

“好办，和六年前一样，抱着黑瞎子皮睡觉。”王海山是个快乐的人，一句笑话说得信子滚出一串热辣辣的泪水。

她和这个鄂伦春猎户在一起生活了六年，每当他踏着咯吱咯吱的厚雪狩猎归来时，总是给信子带回那么多欢乐：五彩斑斓的野鸡，胖墩墩的山兔，肥嫩嫩的狍子，满屋溢香的飞龙……当酒足饭饱，老俩口躺进热被窝时，王海山的故事一直把信子送入梦乡：人参娃娃穿着鲜血的兜肚，山神奶奶拄着山葡萄根做成的龙头拐杖，母老虎奶大一个猎户的弃子，瞎子给患病的老猎人喂水……王海山的故事里没有坏人，就连吃人的野兽都通人性。

信子懊悔当初不理解中国人，丈夫常吉不该带着全家进深山老林逃命。可现在，丈夫早已活生生地饿死了，三岁的小女儿长眠在杂草丛中，两个孩子不知去向，她（他）们的命运如何，他们遇见的中国人也和王海山一样善良吗？她实在不愿离开这位永远快乐而又好心的猎户，但当她想起留在日本的高桥竹男和至爱亲朋，那满街樱花的八户市，那隐在绿荫中的木板小屋，还有那门前唱着恋歌的小溪……一股思念祖国的感情，涌着积压在心头的热血陡然升腾。她睡不着了，坐起来，点上灯，推醒熟睡的海山：“你真的愿意叫我回国吗？”

“要说愿意那是瞎话，这些年你把我惯坏了。可你在日本有比我更亲、更多的骨肉呀！我王海山再不济也长的是人心，对不对？国家还容许你们回去，我能霸着你吗？”

“海山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中国人都这么好……”信子泣不成声了，她把头扎在王海山那宽大的怀里，听着那壮健的冬冬地心跳声，睡着了。

1953年8月，高桥信子登上哈尔滨到大连港的火车，满满地咽下一口离别的酸水，从车窗口伸出半个身子，向愣在站台上的王海山说了声：“海山再见！”她回国了。